

经典传播与文化传承

——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吴 笛 主编

Transmission of Canons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terary Canon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

本书由“浙江大学一流基础学科建设计划”项目资助出版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传播与文化遗产: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吴笛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
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308-09263-0

I. ①经… II. ①吴… III. ①文学—文化交流—世界
—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I1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4489 号

经典传播与文化遗产

——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吴 笛 主编

张逸旻 魏丽娜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4

字 数 361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263-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经典传播与文化遗产》

内容简介

在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研究文学经典是树立和坚守基本道德伦理和价值规范的途径。文学经典作为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各民族核心文化和情感纽带的体现，它所承载的鲜明民族个性不会被时间淹没，起着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作用。外国文学研究者要始终保持选择、确立和传播经典作品的自觉意识，积极面对文学经典在跨文化的旅行中发育演变这一现实，着力推进跨文化视界中的文学经典研究。

文学经典是文化和文学传承的核心，是文学传统延续的中心，反应了某一个时代人类精神的面貌，体现了作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生命体验和想象生成。人类的共同经验成为文学经典得以代代相传的基础，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和文学格局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这意味着文学经典不仅要在本民族内部传承，还要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场域。文学的跨文化交流是经典的传承与变迁的重要方面，不但可以使经典本身焕发出新的生命、折射出新的光彩，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本民族文化的解构和建构，20世纪初期“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20世纪后期“拉美风暴”的引发很能说明问题。为了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本论文集分为“上篇：经典译介与跨文化交流”、“中篇：经典阅读与时代话语”、“下篇：经典诠释与文化遗产”等三个部分。

上篇：经典译介与跨文化交流

本部分论文主要从译介和跨文化视角研究外国文学经典。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文化间的传播越来越便捷，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文学经典的译介与现代传媒的交互作用越来越显著。世界文学经典传承中媒介传播的作用以及当代意义，认为文学经典既是永恒的，又是生成的；永恒意味着文明的传承，而生成则意味着时代的重构。要把文学研究问题扩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特别是扩展到文化传播的领域，把文学问题与文化学问题逐渐结合起来，从而与国际文科整个学科的发展进行接轨。同时，文学经典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得到了推广，折射出新的内涵与外延，现代文学作品也在汲取其它艺术表现形式的丰富养料的同时，散发出新的艺术魅力。

在题为《外国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与影视误译》的论文中，作者就影视艺术对文学经典的改编与“误译”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作为小说的语言艺术与作为电影的视觉艺术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将处于纸张上的语言符号转换成银幕上的视觉符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转换，而是从一种艺术形式到另一种艺术形式的“翻译”。既然是“媒介学”意义上的翻译，那么，忠实原著，尤其是忠实原著的思想内涵，是“译本”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目标。作者以哈代的长篇小说《苔丝》为例，从哈代原著作品中苔丝被害的性质及其对亚雷克的形象把握、“老马之死”等象征和暗示，以及影片的整体风格等方面分析波兰斯基所导演的《苔丝》对原著精神的背离与得失。

在题为《林纾模式和杨宪益模式的启示》一文中，作者论述了合作翻译模式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认为，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合作翻译模式应该是首选。杨宪益的翻译和林纾的翻译就属于合作翻译模式。前者因以源语译者为主而以译语译者为辅，其译作对译语读者影响不大；后者因以译语译者

为主而以源语译者为辅，其译作广受译语读者喜爱。从杨宪益模式和林纾模式中获得启示：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应该采取源语译者与译语译者合作的模式，应该以译语译者为主而以源语译者为辅，应该以译语读者为指向。海外华人在英文创作方面的成功也验证了这些启示。

论文集还就不同体裁的译介展开研讨，在题为《论诗歌作品的翻译特点》一文中，作者认为诗歌翻译的特点在于，除了很难找到语意完全对等的词语以外，还伴随着语言语音层面上的不同，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不同。从心理语言学观点来看，每一母语词汇的语音面貌，在说这一母语的人的意识中，都与大量的词语含义相关联。这些词语含义有时难以捉摸，但是假如翻译时缺失了词语含义，可能就会完全改变原先的意义。因此职业翻译家不仅要很好地了解所翻译作品的词汇构成，还要了解其语音特点，以及作者隐性使用的、由某一语音所连带产生的形象。在题为《韵律的诗意：莎剧素体诗与朱译之诗律对比研究》一文中，认为朱生豪译文中的突出特征是独特的韵律。朱译中的韵律复合、四字顿以及通过韵律手段转换话轮的方式，都体现了朱生豪对于音乐的一种超越文字的崇拜，也体现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些本质特性。

本部分论文强调跨文化交流以及跨媒体传播的重要意义。随着大众教育水平的提高、消费文化时代的到来、现代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图书、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商品经济大潮席卷文化领域并左右人们的文化消费观念和行爲，加上媒体自身多元竞争态势的逐步形成，传统的文化格局被打破，传统文学面临严峻的挑战。文学研究应当重视大众传媒时代文学创作目的、创作方式、存在方式、阅读行为的一系列嬗变的研究。

中篇：经典阅读与时代话语

民族文化记忆的沉淀是催生人类集体智慧的土壤，亦是孕育文学经典生成与发展的摇篮。每一部文学经典的诞生都镌刻着民族记忆的烙印，同时，文学经典必须历经时代的考验，接受民族文明传承的价值批判，才能在代代相承中得以流存。

对于如何将文学经典置于民族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该部分论文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在题为《〈多佛海滩〉的文化命题》一文中，作者通过对《多佛海滩》多重意象的文化解读，打破了传统的“悲情”定式，创新性地提出了诗人在绝望中寻求“进步”与“幸福”的观点。认定阿诺德是借《多佛海滩》倾泻悲情，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如果我们细细揣摩《多佛海滩》的两组中心意象，即“海潮”意象和“夜战”意象，并顺势挖出其背后的文化命题，就不会简单地给阿诺德贴上“绝望”的标签。在潮涨潮落的节奏中，我们可以听到对如下文化命题的追问：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幸福？什么叫有质量的生活？诗中“夜战”意象的含义，也必须放在文化批评的语境中来审视，必须结合“海潮”意象来审视，还必须结合该诗与阿诺德其他作品的互文关系来审视。

在《〈唐璜〉叙事中的空间标识》一文中，作者认为，空间标识在诗歌叙事中广泛存在。无论是诗歌文本中直接出现的空间标识——故事场所或动态空间，还是以此为基本要素所搭建起来的情节结构和情感结构，空间标识均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在诗歌叙事中扮演着各自的重要角色：或提供事件场所，或渲染叙事背景，或构建叙事线索，或增强叙事节奏。拜伦在《唐璜》中除了充分发挥传统的时间要素作为叙事的功能，还别具匠心地利用了空间标识，从而大大丰富了《唐璜》的表现形式，并增强了该诗的表现力。

经典阅读，不仅是回归经典、抵制庸俗的最好的途径，也是

培养道德情操、提升思想品德的有效手段。

在《经典阅读与道德想象力》一文中，作者认为经典阅读或经典重读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通过经典阅读，培养一种更为敏锐的生存感受，获得替代性经历、高度的移情能力和跨文化想像力，进而凝聚人类整体的存在，是人类自我解放和自我启蒙的伦理行为。通过语文学的训练进入经典，是进入作品伦理核心的必经之途。在人性逐渐被物性抽空、灵性逐渐被工具理性抽空，优秀的文学作品逐渐被各种时髦的“主义”解构或架空，实实在在的人文教育理想逐渐被“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取代的时代，回归经典，回归文学，回归阅读或许是一条可能的拯救之路。

而在题为《〈鸟·兽·花〉》看生态意识的形成一文中，作者论述了劳伦斯重要诗集中所体现的生态意识，以及这一生态意义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劳伦斯的《鸟·兽·花》是一个重要的生态文本。其间展示的不仅仅是“生物圈”的生态，更注重的是通过抒写“生物圈”来思考“精神圈”的生态失衡问题。他对现代文明的基本态度决定了他的生态观念以及生态文学作品的创作，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生态自觉，是真正的生态思维，是广义的生态学思考。《鸟·兽·花》的创作，不仅开拓了文学的表现空间，更展现出生态诗人通过文学的力量拯救人的灵魂的精神品质。他这种生态理想主义，在 21 世纪，应能彰显出巨大的意义。

下篇：经典诠释与文化传承

经典诠释对文化经典传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保持文学经典生生不息地流传，就要对文学经典不断诠释。对于经典的关切和尊重，以及对于前人作品的景仰与推崇，都会促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经典的发扬光大。一个民族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在文学

经典中得到了最好的演绎，无论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都存在着“共生互建”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既体现在文化传统的延续，也隐含在民族身份的认同中。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冲击，为在新的境遇中审视文学经典的本质和功能提供了契机。一方面，文学经典的传承衍变，与跨文化的沟通以及中西文化视域的交融息息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教授提出文明约束的缺失，是中国文学经典走向世界的步履维艰的祸因，他强调，如果我们将文学的战斗性看得过重，作品的价值批评非黑即白，那么中国文学经典的世界传播困境将得不到改观。认为要使民族经典成为世界经典，我们一定要有坦诚、勇敢的精神，要认知到自我的偏见，以他者的态度反观自己的文学作品，从而以宽大的心怀，对不同的文化予以关注和关怀。

该部分论文还就具体作家作品的深入诠释，来探讨文学经典对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在题为《契诃夫戏剧在 20 世纪的影响》一文中，作者认为契诃夫作为跨世纪的剧作家，对 20 世纪的戏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艺术风格上体现为静态的戏剧形式，即人物行动的阻滞、人物之间对话交流的隔阂、言语的停顿以及抒情氛围的营造等。从戏剧冲突观念上讲，这种影响体现了淡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突显人与时间和环境的冲突，体现出对人类生存状态之荒诞性的忧虑。而从本质精神上讲，契诃夫对 20 世纪戏剧的影响在于其独特而深刻的喜剧精神。

在题为《外国文学辞典的编撰与经典的普及》一文中，作者认为：所谓“经典”，“经”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重要最核心最有代表性的文献，“典”是有典范性的典籍，从思想到文字都非常完善精美，“经典”是经过时间淘洗并被历史证明，从而确立为不可动摇的代表着一个民族核心理念的文本。“经典”的这一概念后来被广泛移用到其他领域，不再局限于儒家经籍和宗教典籍的范畴。每个民族，每种文化，每一地区，每一时代都会产生各

自的经典，所以经典的形成是动态的，然而经过检验并被证明的经典则会取得稳固的地位，所以已形成的经典就是静态的。“动态经典”不断处于正在“经典化”的过程之中，所以有些暂时被称为经典的作品也有可能被证明不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其权威性受到质疑并被否定，最终因其不具备经典性而被淘汰出局。因此，“动态经典”不断地向“静态经典”转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接受检验不断被筛选的过程。

在题为《思想史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阐释》一文中，作者认为将文学经典置于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或利用思想史的角度理解文学经典，不同于运用单一理论方法讨论文学文本的阐释策略。思想史语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1) 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念，如何凸显在我们现在的精神生活中；2) 我们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基本方式；3) 反思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人们对文学经典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从思想史视野切入文学经典阐释：1) 便于揭示经典产生及传播过程中的精神价值；2) 反思文学史上某些作品的“被经典化”问题及其意识形态功能；3) 对照现有文学经典史，找寻文学思想史上的失踪者；4) 感知文学交流进程中那些思想史文本的独到价值。一句话，文学文本只有在思想史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确认其价值与意义。拓展经典阐释的学术思想空间，以思想史语境式的解读与分析，得出有益于当下社会及人生的启示价值，才能称得上是有生命力的学术研究。

综上所述，在论文集中学者不仅表达了自身的独到见解，也在交流与互动中拓宽了视域，学者们充分肯定了跨文化交流在经典的传承与变迁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对经典的重新阅读不但可以使经典本身焕发出新的生命、折射出新的光彩，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推进本民族文化的解构和建构。